

民国时期影响国人的大师著作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

杨佩昌
著
整理



中国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民国时期影响国人的大师著作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

傅斯年 著 杨佩昌 整理

中国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 / 傅斯年著；杨佩昌整理

·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80220 - 747 - 9

I. ①傅… II. ①傅… ②杨… III. ①史学 - 中国 -
文集 IV. ①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3305 号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

出版人：田辉

责任编辑：梅逸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电 话：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68469781 (发行部)

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hh1985@126.com

印 刷：三河德利印刷厂

监 印：敖 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6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20 - 747 - 9

定 价：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导言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因他不畏强权炮轰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为他赢得了“傅大炮”的雅号，在民国时候，傅斯年是最有个性的文化名人之一。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光绪甲午年举人。傅斯年9岁时，父亲去世，由寡母抚养成人。他天资聪颖，从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6岁入私塾，10岁入东昌府立小学堂，11岁读完《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13岁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7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以病弱之躯，名列第一。

在北大时，傅斯年成绩特优，取得几乎所有课程都接近满分的骄人成绩。虽说傅斯年是一个学生，但他的国学功底非常了得，甚至超过了许多老师。据说当时傅斯年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朱蓬仙的，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老先生的门徒。可是讲起《文心雕龙》来，实在是不敢恭维。于是在课堂上，他就错误迭出，学生深以为苦。恰有某生，借到了朱大教授的讲义全稿。傅斯年高兴得不行，一夜看完，一下子逮住了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上名，上书校长蔡元培，请求补救，书中附列了错误之处。蔡校长对于这些问题自然明白，后来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由于傅斯年出名的才气，当时在北大笑傲一时的刘师培、黄侃和陈汉章等人物，都对傅斯年格外青睐。黄侃尤其对他寄予厚望，时加奖掖，希望对方成为自己衣钵传人。黄侃的算盘打得不赖，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年，北大来了胡适。初到北大时，胡适才27岁，嘴唇上的胡子刚刚有点样

子，他年纪比那些先生们差一大截，倒和学生们差不多。傅斯年开始还对胡适不上心，后来开始留意，再后来终于就跟着上了胡适的道，再不吃黄侃那一套了。

胡适的出现给傅斯年带来了春雷惊梦般的巨大震动，正是他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了新文化运动。抱着为新文化而奋斗的热忱，傅斯年和几位北大同学紧随《新青年》的步伐，创办了《新潮》月刊。《新潮》是北大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并得到了北大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 2000 元作为办刊经费。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傅斯年作为《新潮》的灵魂人物，其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9 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5 月 4 日上午，北京的大学生集会抗议，傅斯年被一致推选为主席。下午，傅斯年扛着大旗率领游行队伍直扑赵家楼，一举成为名震南北的学生领袖。虽然傅斯年没有完整地参加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但是他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和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 1919 年至 1926 年，他先后留学英、德，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1926 年冬，傅斯年留学归国，回国后一直在教育与研究部门任职，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

1928 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 23 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七十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 15 次，大

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1938年起，傅斯年作为社会贤达一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傅斯年的雅号叫“傅大炮”、“傅老虎”，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炮轰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并把他们轰下了台。

做国民参政员时，傅斯年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危机来自内部的腐败，他曾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终于把孔轰下台来。孔祥熙走后，宋子文来做行政院长，开始，宋子文的一些做法深得人们好感，傅斯年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他的好话，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又开始倒宋。1947年初，他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列举了宋子文种种劣迹，认为他搞乱了工业，搞垮了经济，其贪污腐败行为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也当上了接收大员，飞到了北京。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干，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但他又坚决要求去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他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认为，像胡适这种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要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舍不得离开北京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个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路。

1949年1月，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台大实行改革，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他对台大的影响之巨，与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相仿。1950年，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傅斯年同时代的学者曾指出过，他寄身政治，因此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他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经足以让他立足于大师的行列了。史料学派的代表作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收录了傅斯年先生1918年至1941年的13篇有关史学问题的学术文章。其中以《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为代表，在此文中，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其他12篇文章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

想。《史学方法导论》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可惜全本迄未得见，目前各家出版社出版的只是残篇。

信奉“史学即是史料学”为治史格言的傅斯年，非常强调史料搜集与整理考订对历史研究的特殊意义，他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据此，其对史学方法的论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展开。

一、关于史料的搜集。在历史研究中，傅斯年最为注重第一手史料及各种新材料的发掘运用，以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富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因此，要推进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改变旧史学中“书院学究”的研究方法，吸取自然科学重视经验和实地考察之法，到“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案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通过实地调查神祇崇拜、歌谣、民俗和考古发掘，尽量扩充材料范围，进而“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

二、关于史料的整理。他在这方面的讨论大致集中于二点：第一，是充分运用现代“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这里所谓的“工具”，指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各种科学的知识及研究方法；第二，是比较的方法，他认为，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的应用，因为史料反映的史实有正有误，有缺有全，有不同的侧重面或特点，只有通过不同来源和不同类型史料的对勘互补，才能逐步接近史实的真相。傅斯年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在当年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由此成就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使得中国的史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相当的地位，其本人亦被标举为“史料学派”的盟主，人称傅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奠基人。

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在这里表示衷心的谢意。

目 录

第一篇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3
第一章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4
第二章 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	26
第三章 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	29
第四章 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	31
第五章 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	32
第六章 本事对旁涉	33
第七章 直说与隐喻	34
第八章 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	41
第二篇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43
第三篇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51
第四篇 史记研究	79
第五篇 战国子家叙论	93
第六篇 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	135
第七篇 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	151
第八篇 考古学的新方法	157
第九篇 明成祖生母记疑	165
第十篇 夷夏东西说	177
第一章 亳一商一般	179

第二章 夏 迹	195
第三章 夏夷交胜	201
第四章 诸夷姓	208
第五章 总结上文	220
第十一篇 说《广陵之曲江》	227
第十二篇 谁是《齐物论》之作者？	233
第十三篇 谁是《后出师表》之作者？	245

傅斯年

史学方法导论

第一篇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第一章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

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记“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振玉的）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它，金文更讲不通。

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它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它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它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它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它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它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图章的。

二、对新发现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例如根据秦人小篆，兼以汉儒所新造字，而高谈文始，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

标举五例，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

例一 王国维君《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原文太长，现在只节录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下篇的“商先王世数”一节，以见其方法。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到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第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第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第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现也多。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那么，王君这个工作，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

王 亥

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虚书契前编》有二事，曰：贞収于王亥（卷一第四十九叶），曰：贞之于王亥卅牛辛亥用（卷四第八叶）。后编又有七事，曰：贞于王亥求年（卷上第一叶），曰：乙巳卜口贞之于王亥十（下阙同上第二十叶），曰：贞収于王亥（同上第十九叶），曰：収于王亥（同上第二十三叶），曰：癸卯口贞口口高祖王亥口口口（同上第二十一叶），曰：甲辰卜口贞辛亥収于王亥卅牛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叶），曰：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叶），曰：贞之于王亥羊口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叶）。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曰：贞収于王亥五牛（卷一第九叶）。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核。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核字之讹也。《大荒东经》

曰：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𦥑，与亥字相似，王𦥑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学记》卷九十引，又《御览》八百九十九引《世本》，鯀作服牛，𦥑亦胲之讹。《路史注》引《世本》胲为黄帝马医，常医龙。疑引宋衷注。《御览》引宋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皆汉人说，不足据。实则《作篇》之胲，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胲，有扈即有易（说见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洪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盖亦其俦。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王 恒

卜辞人名于王亥外又有王𠂇。其文曰：贞之于王𠂇（《铁云藏龟》第一百九十九叶及《书契后编》卷上第九叶）。又曰：贞𠂇之于王𠂇（《后编》卷下第七叶）。又作王𢃑，曰：贞王𢃑口（下阙，《前编》卷七第十叶）。案，𠂇即恒字。《说文解字》二部；𠂇，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𠂇，古文𠂇从月。《诗》曰：如月之恒。案，许君既云古文𠂇从月，复引《诗》以释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𠂇，从二，从古文外，盖传写之讹，字当作𠂇。又，《说文》木部：智，竟也，从木𠂇声。𢃑，古文智。案，古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殷虚卜辞朝莫之朝作𦨇（《后编》卷下第三叶），从日月在𦨇间，与莫字从日在𦨇间同意，而篆文作𦨇，不从月而从舟。此例之𢃑本当作𠂇。智鼎有字𦨇，从心从𠂇，与篆文之𠂇从𢃑者同，即𠂇之初字，可知𢃑𠂇一字。卜辞𢃑字从二从𠂇，（卜辞月字或作𠂇或作𠂇）其为𢃑𢃑二字，或恒字之省无疑。其作𢃑者，《诗·小雅》：如月之恒。毛传：恒，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然则𢃑𢃑二字，确为恒字。王恒之为殷先祖，惟见于《楚辞·天问》。《天问》自“简狄在台善何宜”以下二十韵，皆述商事（前夏事后周事）。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此